

# 語言對比及其相關理論的拓展空間

## ——兼論邁向21世紀的對外漢語教學

凌德祥

南京大學

### 一、比較方法與比較語言學

比較方法在語言學研究中一直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實無論是比較分析還是對比分析，究其實質都是運用了比較方法去研究語言的。所不同的是，比較語言學運用比較方法研究多種語言並試圖研究其譜系關係或結構類型，而對比語言學則主要比較母語（母方言）和外語（目的語言）的異同以便指導語言學習與語言教學與翻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比較方法研究語言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了。在傳統的語文學時期，世界各國很早就曾普遍地通過對古今語言的比較，來達到通經致用的目的。中國古代學者還曾比較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並根據其社會功用把它們分為「雅正」和「方俗」兩類。「雅正」之語即為權威語言，非「雅正」的「方俗」之語則被貶為「不正之語」。語言對比分析源於外語（或外方言）教學與學習，因此只要有外語（言）教學與學習，就必然有語言的對比。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語、多方言交融的大國，人們在學習外語、外方言或標準語（通語）時必然要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早在漢朝，中國的揚雄就在廣泛的調查基礎上寫出了一部十三卷的《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在這部世界上最早研究方言的著作中，揚雄對當時的許多「方言」現象進行了細緻的描寫與比較。據說，阿卡德人（Akkadians）在古代侵入兩河流域（「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以後，逐步統一了兩河流域的中南部，公元前2350年，薩爾貢（Sargon）國王建立了統一的阿卡德王朝，並征服了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人（Sumerians），實行阿卡德語和蘇美爾語雙語文，他們在學習蘇美爾語時就用了對比的方法。（見（4）P. 94和（6）P. 26）但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語言學或對比分析應用於語言學教學的對比語言學的形成則是在很晚以後的事情。

1786年，英國的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通過比較研究，確定印度古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和日耳曼諸語言有歷史上的親緣關係，從而揭開了史稱「歷史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或「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研究的序

幕。到了19世紀初，丹麥的拉斯克 (F. Rask)，德國的格林 (J. Grim)、葆樸 (F. Bopp) 和洪堡德 (W. Humboldt) 等人擴大了研究範圍，比較分析了波斯語、日耳曼語、冰島語、立陶宛語和古斯拉夫語在內的一大批現代和古代的語言，對存在於這些語言之間相似而成系統的語音對應關係進行了科學的歷史的解釋，正式奠定了歷史比較語言學。

歷史比較法的理論依據是語言符號音義結合的任意性和親屬語言之間語音對應的規律性。歷史比較語言學根據語音的這種系統對應關係，比較這些親屬語言或方言的差別來擬測「原始共同語」，再由這「原始共同語」來解釋與各親屬語言的關係及其分化情況。由於當時學術界普遍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譜系理論的影響，德國的施萊歇爾 (G. Schleicher) 提出了語言的譜系樹理論 (Family tree theory)，他認為，所有親屬語言都源於一個原始共同語，後世的種種語言都是由這一原始共同語分化而來的。雖然這一研究頗有些循環論證之嫌，但歷史比較語言學試圖構擬原始共同語並且擬定出語言的種種演變階段和規律，從語言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解釋語音在共時狀態上所呈現出來的系統對應，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些研究為探究人類早期歷史和原始語言形式及語言演變規律等方面展示了令人振奮的前景，激起了語言學家對語言的本質和語言分析方法的廣泛研究，促進了普通語言學的發展，使語言學最終擺脫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真正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就在歷史比較語言學形成之初，一些西方學者已開始注意語言結構類型的比較研究。19世紀初，洪堡德在致力於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的同時，也完善了語言類型的比較研究，並建立了語言類型學 (Typology)。語言類型學可以不考慮語言的歷史來源，只是根據語音、語法和詞匯特徵進行類型分類。由於受到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語言結構類型的比較研究最初只是作為歷史比較法的一種補充，主要用來「內部擬測」原始共同語的語言學結構。但是語言結構類型的比較研究卻直接導致了結構主義的現代語言學的產生，並隨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將語言結構類型比較研究推向了頂峰。

## 二、對比語言學的三大基石

19世紀末，受到語言結構類型比較研究的影響，在外語教學中，很多學者已注意到「母語遷移」(Pull of mother language) 現象，因此，開始通過比較外語和母語的語音系統來解釋外語學習的這種遷移現象。語言結構類型的比較和語言的遷移理論為對比語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1年，沃爾夫 (Benjamin Lee Whorf) 為了把這一研究與其他形式的比較語言學相區別，在其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 的術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形勢的需要，外語教學得到蓬勃的發展，對比分析也就成了外語教學中最有價值的方法之一。1957年拉多 (R. Lado) 在其出版的《跨文化的

語言學》(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中系統論述了語言對比的理論與方法，標誌著對比語言學的正式形成。由於對比語言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指導外語教學，所以人們在學習目的語過程中所出現的偏誤現象也就成為對比語言學所關注的對象。受到當時佔統治地位的語言類型比較的影響，對比語言學在創立之初一直局限於對母語與目的語的語言結構進行對比分析，並用母語遷移理論來解釋外語習得過程中所出現偏誤現象。這樣對比分析、遷移理論和偏誤分析就形成了支撐對比語言學的三大基石。60年代以後，隨著語義學、語用學、文化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等現代新學科、新理論的興起與發展，對傳統的對比語言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特別是到了60年代末，在認知心理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介語理論」，在外語教學中，被廣泛用來解釋和分析語言學習中所產生的偏誤，一時間，外語教學研究中言必稱「中介」與「偏誤」，以致於人們誤以為偏誤分析就是「中介語理論」的獨創。特別在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語言學學界從事對比分析研究的人越來越少。80年代末，語言對比研究在中國也曾一度出現衰落，多數學者認為對比分析和對比語言學已經走上了末路，即使是一些比較嚴謹的語言學家也認為對比分析和對比語言學至多只是在某些情況下才是有用的，因此對比語言學似乎已被判定為一種過時的學科。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一方面，中介語理論和偏誤分析並不是與對比分析和對比語言學相對立、相排斥的一門學科，另一方面，就在對比語言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沉落和反思以後，在吸收包括中介語理論在內的現代新興學科理論滋養的同時，正於80年代末開始向更高階段發展。語言對比分析研究正逐漸從由單純的語言結構對比擴展到語義、語用甚至功能、文化和思維等外部的宏觀對比，對語言習得過程出現的偏誤分析也更為科學合理。90年代以來，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對比語言學在我國得到再度繁榮。僅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所編的《報刊資料索引》1990年到1996年所列漢外語對比類文章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看到，漢外語言對比(比較)研究的文章數量從1992年起呈上升趨勢，並且已經遠遠超過了單純的漢語教學或外語教學研究的文章。見下表：

類別 篇數 年份	漢外語言比較		漢語教學		外語教學研究
	漢外語言對比   漢外翻譯		漢語語文   對外漢語		
1990	39		8		17
1991	25		40 (語言教學)		(40)
1992	38	107	41		24
1993	51	112	53	25	42
1994	47	118	64 (4)	29 (16)	35
1995	69	124	51	17 (2)	24
1996	77	149	26	29	28

1990年與1991年《報刊資料索引》分為「漢外語言比較」、「漢語教學研究」和「外語教學研究」三類。其中「漢外語言比較」基本涵蓋了後來的「漢外語言對比」和「漢外翻譯研究」兩類。1991年「語言教學與研究」類中收有「漢語教學」和「外語教學研究」類的文章。1992年又單列「外語教學研究」、「漢外翻譯研究」類，同時將「漢語教學」改為「漢語口語、漢字教學」，1993年又改為「漢語、漢字教學」，並把「漢外語言比較」改為「漢外語言對比」。1994年又把「漢語教學」類分為「漢語語文教學」和「漢語教學」（用括號表示）兩類，1995年始又合為「漢語語文教學」並在「對外漢語教學」類外又列「國外漢語教學」類（用括號表示）。

根據上表所反映的情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比語言學的對比分析，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和外語教學研究中仍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 三、中介語理論、偏誤分析與對比語言學

中介語理論在國外是在語言對比研究和偏誤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開始被廣泛地運用於外語教學。但是「中介語」(interlanguage)的概念被認為是最早是由賽林格(L. Selinker)於1972年正式提出的。現在國內一般對「中介語」的理解為：中介語是由於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目的語的規律所作的但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而產生的一個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又區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見(5) P. 126)

但是也有人把「中介語」理解為「思維語言」、「媒介語言」或類似於詞語釋義的「解釋語」。如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譚傲霜在《漢語教學與中介語》(見(12) P. 42)一文中認為：「廣義的中介語應該是指以自然語言作為描寫對象的語言。本文所用的狹義的中介語，指的是從思維到語言過程中對言語行為的類別進行描寫的語言。正是它能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起到不同語言的媒介作用。」熊文華在《中高級階段翻譯課教學中的文化對比問題》(見(9) P. 397)中說到：(漢語的「旗袍」等和英語的「kit」等)「這些詞語一般都不能直譯，也不能全部音譯。即使採用意譯法有時候也必須用中介語詮釋。」這兩位先生所說的「中介語」與目前作為學習理論的「中介語」概念應屬不同的範疇。

「中介語理論」實際上也包括三方面內容，首先該理論揭示了語言習得過程中的中介現象，二是進一步提出了語言習得中的過度泛化等原理，三是偏誤分析。中介語理論實現了劃時代的由「教」到「學」研究重心的轉變，把偏誤看成是語言習得中動態的變化過程，拓展了對產生偏誤根源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對比語言學與偏誤分析的研究，對語言習得和語言教學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中介語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偏誤的中介性，其研究重點仍在「偏誤」，但是「偏誤」不代表語言習得的全部內容。「中介語」理論提出後，對於真正的「中介語」研究還很少，原因在於其解釋性有限，也缺少實際的可操作性。因為

學習者所習得的目的語不可能整體上都是一個獨立於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所謂「中介語」系統。在外語習得中，也很少是屬於真正的中介式的言語。因為從理論上講某一言語只有同時處於母語與目的語的牽引作用並真正既不同於母語又不同於目的語時才會出現言語的中介現象，這在語音層面可能有一定的解釋力。比如有些英美學生在學漢語時發出介於英語中「dʒ、tʃ、ʃ」和漢語的「zh、ch、sh」之間的所謂不到位的音。而像把「zh」唸成漢語中標準的「z」，或很多在詞匯、語法、語用等層面上的言語現象，很難完全地用「中介語」來解釋。習得者所習得的外語應該被看作一個整體，說對之處應該就是標準的目的語，談不上是所謂的「中介語」，大多數偏誤的言語，其正確部分應仍屬於標準目的語形式，即使是偏誤部分很多也至多是不太規範（標準）的目的語形式，而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中介語」。如果把有偏誤言語就看作是「中介語」，那麼外語學習就只會永遠處於那種假定的「中介語」狀況，這樣即使是本族人也不可能最終真正學成那種「純而又純」的標準語，因為本族人同樣也會有偏誤。所以，試圖把中介語作為一種普遍的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語言系統」來研究其普遍的語音、語義、語匯、語法或語用結構體系，恐怕會誤入歧途。應該把「中介語」看作是一種外語學習過程中的一種受綜合性因素影響的一種不斷變動的狀態。因為語言習得雖有其共性的規律，但具體的言語卻會因人而異，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又是千差萬別不斷變動的。國內自1984年（見（15））開始漢語中介語研究以來，發表文章的數量不太多，多數是介紹中介語理論或作些漢語的偏誤分析，比較系統全面的研究則更少。90年代初，一些學者試圖建立「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系統」（見（12）P. 5），對第一語言為非漢語的學生的（正誤）漢語語料作全面細緻的記錄、描寫，這個課題無疑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如果語料庫不僅僅是試圖建立一個籠統的「中介語」系統，而是真正細緻而有分別地記錄、描寫了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不同學習階段中的漢語習得情況並作了動態的統計分析，這一研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對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另外，我們應該看到中介語理論實際上仍屬於對比語言學範疇。首先，中介語理論必須要用對比方法，因為，只有通過對母語或目的語習得者所說言語進行對比。才可以真正確定出所謂的既不同於母語又不同於目的語的「中介語」。偏誤分析同樣也離不開「偏誤」與母語或「規範」（正確）的目的語進行對比。另外，語言習得的過度「泛化」原理在中介語理論中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語理論常用它來解釋不同於母語遷移的某種語言偏誤現象。很多人並以此來否認對比語言學。其實這一原理並非中介語理論所首創，它恰恰是來自比較語言學，屬於比較法之一的「類推法」。早在1964年，英國語言學家羅·亨·羅賓斯（Robert Henry Robins）在《普通語言學概論》的「語言比較」一章中專門論述了「類推」。羅賓斯認為：「可以說偏離嚴格運用有規則的語音演變的另一個因素是類推（analogy）。類推是語言史上的一種普遍過程。……西方的古人們很了解很感興趣的語言

(主要是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詞形中的兩種成對比的特徵，——規則和不規則，把它們分為類推和變則(anomaly)；不同的學者把其中的一種或另一種強調為主要特徵。」雖然羅賓斯主要是論述語言演變中的類推現象，他同時也論述了類推在語言習得中的作用。他指出：「當說話雙方說出和理解從沒有聽到過的每個句子時，當某個說話人使用他的經驗中從未同某一特定詞根一起出現過的可變詞形變化的類似形式時，類推就會發揮作用。……用按照有關詞所屬的詞類中大多數詞的形式仿造出的新形式，來替代不規則的或異干的形式，就是類推創造產品。在沒有徹底掌握這一種語言的兒童或說外語的言語中，這方面的個別例子屢見不鮮。……這就是類推創造。」羅賓斯還指出「這類誤用的形式常常得到別人的糾正，而且過了個人言語習得時期便不復產生。然而，由於某些尚未弄清楚的原因，有些個人變異卻繼續存在，並為範圍越來越大的別的人所採用，直至它們也開始為人們所公認，並且最終取代了原來的形式。」(P. 292、293)這不僅清楚地說明了語言習得中類推作用導致語言的歷史變異，對我們研究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不同語言背景的人所出現的某些帶有共性的偏誤現象(如「留學生方言」)，同樣也有著重要的啟示。

通過對「中介語理論」和「偏誤分析」的全面了解，可以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對比分析與對比語言學的認識。中介語理論不僅不是作為對比語言學對立物，而是應該看到是補充與豐富了對比語言學的研究。

#### 四、對比語言學的世紀展望

對比分析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可以運用於包括母語與目的語的語言間的對比，它還可以廣泛地運用於方言與方言(標準語)、古今語言、正誤語言之間以及不同習得階段的言語現象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對比分析與對比語言學不僅對外語教學與翻譯有著重要意義，對標準語和古代語言的教學同樣也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廣泛的語言對比研究同樣也可以加深母語(或母方言)的認識。應該看到，對比語言學是個逐步發展的學科，其間至少經過了以下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對比分析	研究重點：語言結構系統對比 理論基礎：結構主義語言學	語言的多層面對比 語言學等多學科
偏移研究	研究重點：母語遷移 理論基礎：行為主義心理學	中介語 認知心理學
偏誤分析	研究重點：母語干擾 理論基礎：正負偏移	泛化、交際等多種因素影響 對比、偏移、類推與中介語等

因為多數人認為，語言習得既然沒錯或不易出錯就沒有重視的必要，只有偏誤的地方才需要在通過教學加以糾偏，因此對比語言學一直都非常注重偏誤研究，但客觀上忽視了非偏誤語言習得的研究。實際上，「誤」與「正」是個對立的統一體，離開了「正」的研究，「誤」就會無所依託。通過非偏誤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哪些形式在習得中對某類學生一般不會出錯或很少出現偏誤，有助於加強教學的預測性和教學安排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揭示在正確形式掩蓋下的規避性「苟簡」或過分審慎性「過繁」以及「語用性擴大」、「語用性縮小」和「語用性轉移」等表達方面一些不太得體的基本規律。雖然「規避」、「審慎」與「語用移位」等都是很實用的交際策略，但對進一步提高語言水平卻有很多不利的影響。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中，仍主要局限於對詞匯、語法或語音層面的語言結構進行偏誤分析。我們知道，語言對比是建立在充分描寫基礎之上的，由於漢語和外語的語用、語境層面描寫研究不夠深入，因此這方面的對比研究或偏誤分析相對較薄弱，另外，偏誤研究本身，對哪些是「正」，哪些是真正的「誤」，哪些是正中有誤或誤中有正缺乏一定的界定和和分類的量化分析。跨世紀的對外漢語教學，今後應該加強對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在語言習得的各個階段的漢語學習情況作全面的記錄描寫，統計出相應的正確率或偏誤率，從而可以排出不同語言層面的內容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難度系數，這樣就可以為教學和教材編寫等提供更加具體、實用的參考。另外，即使是對偏誤也應該從不同的角度開展研究。目前學術界把偏誤（錯誤或偏差）主要分為母語遷移、目的語過度泛化、交際策略、偶然因素等類型的偏誤，中介語理論還把偏誤分成偶然因素形成的「失誤」(mistake)和「偏誤」(error)兩類。為了能對偏誤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的研究，我們認為應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偏誤：

#### (一) 從語言交際角度

「語際性偏誤」，是指因母語遷移等影響而形成的母語化或「洋涇濱化」外語。

「語內性偏誤」是對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知識作超常規類推或因近形、近音等形式的混淆而形成的偏誤。

「語境性偏誤」是因言語表達與特定的語流（上下文或前後語）、情境、場境和背景等語境發生錯位。典型的語境性偏誤一般表現為話語片段本身是正確的，但不合特定的語境（「得體性偏誤」）。如某外國學生在10點鐘看到一個剛起床的人打招呼說：「您早！」雖然這可能是受到其母語"Good morning!"的影響，但在這裏主要是不合語境。因為「您早！」在漢語中多用於早上較早時間或相對某個特定時間（如起床、晚會）以前對可能先於自己的人所說的客氣話。而此人10點才起床，並不「早」了，此時說這樣的話反而有些譏諷的意味了。

## (二) 從偏誤形成方式角度

「類推性偏誤」指因用已習得的語言文化知識(包括母語言和目的語言文化知識)的泛化類推。類推對語言習得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因此在糾正學生的類推偏誤時注意盡量不要損傷學生類推創造的積極性,否則在教學中會因小失大的。

「記憶性偏誤」反映了學習者掌握語言的熟練程度。主要受到語言文字等因素的影響,或記憶的偶然性障礙。像近形、近音的語言形式往往會增加記憶難度從而容易導致偏誤。如想說「我吃飽了。」卻說成「我吃包子!」。另外因身體情感或場境等等內外部因素的干擾導致的暫時性記憶性障礙,如想說「你好!」卻說成「再見!」隨著學生語言熟練程度的提高或偶然因素的消失,這類偏誤會自行減低的。

「誘導性偏誤」主要指因教學、教材或學習伙伴等方面的誤導形成的偏誤。如漢語的「哪裏,哪裏」很多教材翻譯為"thank you",導致學生在答謝別人的幫助時也說「哪裏,哪裏!」可能「哪裏,哪裏」的較為妥當解釋應為「不,不,不怎麼好。(中國人習慣於用否定式自謙回答別人的誇獎,以示客氣)」這樣就可減少這類偏誤。這同時也反映了母語干擾。因為,在英語中"thank you"是可以上述兩種場合說的。可見偏誤有時不僅僅來自一方面的或單一因素的干擾,而同一偏誤形式又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由此看來,似乎還可以分出「綜合性偏誤」。

## (三) 從語言習得過程角度

「發展性偏誤」是指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某個階段中不可避免所出現的偏誤,故又可稱為「階段性偏誤」。如一個英語區的學生剛學漢語,我們教其「東西」一詞時,不可能也不應該將其所有的意思和用法都告訴他,可能一開始只需要簡單解釋為"thing(s)",在以後的習得過程中他會利用類推創造,在組成新的言語時他可能會用對,也可能會類推出錯(如說出「老師不是東西」)。這類偏誤在學習的某個較低的階段必然會存在的,但隨著語言習得或教學的深入提高,這類偏誤應該適時地逐步得到糾正。我們不能為了過早預防這類偏誤,而過多地講解其意義及用法,這樣有時反而會出力不討好。

「非發展性偏誤」主要是指記憶性的或誤導性的偏誤,這類偏誤大多需要也可以及時糾正。

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對發展性偏誤、記憶性偏誤、誘導性偏誤關注較少。如能對上述這些偏誤進行全面研究,肯定會有助於對比語言學與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更深入發展。

## 主要參考文獻

- 1 Robert Henry Robins (羅賓斯)：普通語言學概論 (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5月。
- 2 呂必松：對外漢語教學發展概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年7月。
- 3 呂必松：對外漢語教學概論 (講義)，國家教委對外漢語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1996年6月。
- 4 盛炎：語言教學原理，重慶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 5 Timothy Lilght (黎天睦)：現代外語教學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7年3月。
- 6 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
- 7 陳建民、譚志明主編：語言與多文化教多學科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7月。
- 8 趙永新：語言對比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華語教學出版社，1995年6月。
- 9 趙永新主編：漢外語言文化對比與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
- 10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第四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7月。
- 11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年6月。
- 12 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提要，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會務工作委員會秘書處，1993年北京。
- 13 《世界漢語教學》編輯部、《語言文字應用》編輯部《語言教學與研究》編輯部：語言學習理論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6月。
- 14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秘書處：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成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年1月。
- 15 魯建驥：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學學與研究，1984年第3期。
- 16 王建勤：中介語產生的諸因素及相互關係，語言教學與研究，1994年第4期。
- 17 戴曼純、王湘玲：誤差分析：問題與思考，外語界，1997年第3期。
- 18 莫雷：論學習遷移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 19 張衛、郭淑斌：問題解決的類比遷移，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 20 王穗萍：動作技能學習的遷移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 21 何先權：關於學習遷移問題的兩點思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 22 凌德祥：語言的比較研究與方法的革新，漢語學習，1990年第1期。

- 23 凌德祥：從語言的比較研究中去認識漢語語法的特點，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
- 24 樂眉雲、凌德祥：客贛方言對英語發音影響的調查分析及教學對策（漢英對比研究之一），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專輯），1993年版。
- 25 樂眉雲、凌德祥（執筆）：湘方言區學生英語發音調查及常誤分析（漢英語言對比研究之二），外語研究，1993年第4期。
- 26 樂眉雲、凌德祥（執筆）：漢語各方言區學生英語發音常誤分析（漢英語言對比研究之三），外語研究，1994年3期。
- 27 凌德祥：適應不同程度學生的漢語語義教學，中國語文通訊（香港），1997年9月第43期。（CIEE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專題論文）
- 28 凌德祥：語境與語用歧義，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

## 稿 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為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來稿一經接納，版權即屬本刊所有。未經本刊書面同意，不得在他處發表或另行出版。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正楷橫寫。電腦打字稿，請附磁碟。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謄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合用或不合用的稿件，均於三個月以內回覆作者。

來稿刊登後，當致送薄酬，另平郵寄贈當期刊物五冊。

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